

一、緒言—國父確是一個大軍事家

中華民國的締造者，中國國民黨的手創者，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建設者——國父孫中山先生，向來一般人都一致推崇他為現代中國一個大思想家，大革命家，大政治家，卻很少認識他也是一個大軍專家，在遺教中建立了現代中國革命的戰爭理論。這個整理和闡揚的任務，正待我們今日來把它完成。

國父一生雖沒有機會進過軍事學校，卻常和軍事專家研究軍事，並自修古今中外的兵書，尤以他卓越的天才，和在西醫學校時代科學修養的精湛，更助他成為一個大軍事家的所在。國父原是愛好和平的，但為完成國民革命，不得不採用戰爭手段，亦即「革命的手段」，一個健全的革命領袖固要擅長政治，亦須兼長軍事。退一步說，縱不一定要有有用兵的天才，起碼亦需懂得軍事。

現在我們研究國父的革命戰理，首先應知道國父研究軍事及指揮軍隊的經過實情，因為這是國父成為一個大軍事家的所在，亦即國父戰爭理論的淵源。

一、國父研究軍事的經過

根據我們的考證：國父的研究軍事應溯源於太平天國滅亡後十年，國父十一歲在村塾讀書時，村中有一個太平天國的遺兵，常到塾裏為學童講述洪楊革命的故事，國父聽得，深慕洪秀全之為人，推翻滿清之志，不禁油然而生，遺兵對國父特加愛許，一遇無事，便和國父詳談當年戰事，如洪秀全怎樣起義，怎樣從廣西打到湖南，打到武漢和南京等等。並以洪秀全第二勉國父，國父得此徽號，引為無上榮耀，亦輒以洪秀全第二自居。

國父自決心致力革命之後，對於軍事學術即特別留意，一八八七年（丁亥）入香港西醫書院研習醫學，常置鉅幅中國地圖於樓壁，對之而籌思攻守之方。此為兵要地理研究的開始。又與陳少白、尤少納，楊鶴齡三人昕夕往還，亦常研究軍事問題。一八九四年（甲午）北上上李鴻章書，並「遊東北京津，以窺清廷之虛實，深入武漢，以觀長江之形勢。」（「自傳」）此為政治軍事的實際考察。

一九〇三年（癸卯）夏，國父由安南東渡日本，致力外交活動，結識日野熊藏少佐，日野留英多年，為日本軍事專家，以研究南非洲波亞人（註一）抵抗英軍所採用的散兵戰術，及發明日本式盒子砲，聞名於時。國父認此種戰術最適用於揭竿起義的中國革命軍，乃與日野研究，除筆記其口述外，並購置英文的英波戰史及圖書百數十卷，日夕觀摩，孜孜不倦。同時為實施同志以軍事訓練，又秘密組織「革命軍事學校」於東京，延聘日野為校長。小室健次郎大尉為助

教，學科除普通兵學及製造盆子砲炸藥外，尤注重波亞人散兵戰術的傳授。第一期學生共十四人，開課之日，國父親臨致訓，聽者深受感動。至於國父當時為推翻滿清，在粵桂邊境及各地所組織的革命軍或稱「民軍」，類似今日的游擊隊，戰鬪所用的戰術，即是散兵戰術（亦稱「波亞戰術」）。往後國父於民元發表「錢幣革命通電」，曾暗示採用散兵戰術以抵抗帝俄。迄民十於「軍人精神教育」的講詞中又主張採用游勇戰術（即散兵戰術），以與北方軍閥交戰，可見國父對散兵戰術的心得，及起義軍事所受散兵戰術的影響。

國父的學問博而精，對古今中外有用之書，無所不讀，兵書尤為愛好。加以他的虛懷若谷，又常與外國軍事專家，像上述的日野，便是其一。此外還有美國「天下最傑出軍事家」堪馬利將軍（註二），俄國嘉倫、李糜及英德法將校多人。

國父對普通軍事書籍，如典範令及各種教程，莫不熟讀。在「民權初步」的自序中曾提及步兵操典說：「兵家之操典，化學之公式，非瀏覽誦讀之書，乃習練演試之書也。」「軍人精神教育」裡亦提及游勇戰術的伏擊技能「與操典中所謂利用地形或地物者卻相暗合。」對於外國軍事名著更為愛讀，據一位老同志最近給我的信說：「總理所讀各國兵書，以德著英譯為多。據言：軍事學以德著為第一。」又說：「總理對外人用兵者最崇拜拿破崙，書架上滿置各國名人關於拿破崙之著作。癸卯年（民前九年）曾語人謂：拿破崙略，百年後始大放光明，蓋歐人研究拿破崙戰略之佳本，多出版於百年以後也。總理對拿破崙每次戰役，皆瞭如指掌，有條不紊，據言：諸役以攻奧一役為最神妙，於戰史上最具有價值。」（註三）其對於我國古代各兵家兵法，亦有精湛研究，就中以孫子兵法為最。曾評該書說：「二千多年前的兵書有十三篇，那十三篇兵書，便是解釋當時戰理，由於那十三篇兵書，便成立中國的軍事哲學。」（「民權主義」第一講）又對同志說過：「拿破崙的作戰，深得孫子的蘊奧。」（註四）原來拿破崙在歐陸作戰，陣中常披閱法譯孫子兵法。當對同志講解太平天國戰史及其他攻守之事，輒引孫子的原理原則來說明，有時並很詳細地指出那原理原則見於孫子兵法中第幾篇第幾頁第幾行。（註五）

此外，國父於各種演講中常喜以軍事為喻，他說：「不像兵船操典，過了十年，便成無價值的廢物。」（「民權主義」第五講）又說：「譬如練兵打仗，便要用軍事家。」（第六講）又說：「亦猶之軍人上陣戰爭，必須明白其槍砲之效力，及其用法。……譬之軍人提槍射擊，若命中，其人必死，否則亦傷。」（「軍隊戰勝與黨員奮鬥」講詞）又說：「這次的大會（指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浴日註）好像是一個大軍事會議，定了種種作戰計劃，下了許多攻擊命令，交各將領帶回去實行作戰一樣。又好像是一個大兵工廠，製了許多槍砲，出了很多子彈，諸君在此領了很多槍砲子彈，回到本地地方去，便要分給到各位同志去補充他們，各位同志得了補充，便要他們實行攻擊，不可空耗了這些補充，到了實行攻擊的時候，必須審察敵情，臨機應變，對於敵人要能夠收效，那才算是

不枉費了這補充。」（「黨員之奮鬥同於軍隊之奮鬥」講詞）於此，亦足見 國父對於軍事的興趣與研究。

二、 國父指揮軍事的經過

國父致力革命，認為欲掃除革命的障礙，不是單採取和平手段所可完全奏效，必須假以軍政時期，斷然採取戰爭的手投。在歷史上，像我國的湯武革命，美國的獨立運動，法國和俄國的大革命。

國父於一八八五年（乙酉）中法戰爭結束之時，即決意致力於推翻滿清的革命運動。正如自傳所述：「由是以學堂為鼓吹之地，以醫術為入世之媒。」而首先採取軍事行動，以圖推翻滿清，係肇端於一八九五（乙未）廣州之役（第一次起義）。如自傳說：「欲襲取廣州以為根據，遂開乾亨行於香港為幹部，設農學會於羊城為機關。當時贊襄幹部事務者，有鄧蔭南、楊衢雲，黃詠商，陳少白等。而助運籌於羊城為機關者，則陸皓東、鄭士良，並歐美技師及將校數人也。予則通常往來廣州香港之間，慘淡經營，已過半載，籌備甚週，聲勢頗眾，本可一擊而生絕大之影響，乃以運械不慎，致海關搜獲手槍六百餘桿，事機乃洩，而吾黨健將陸皓東殉焉，此為中國有史以來為共和革命而犧牲之第一人。同時被株連而死者，則有丘四，朱貴全二人，被補者七十餘人，而廣東水師統帥程奎光與焉，後竟病死獄中，其餘之人或囚或釋。此乙未九月九日，為予第一次革命之失敗也。敗後三日，予尚在廣州城內，十餘日後，乃得由間道脫險出至香港。」這一役， 國父是在廣州親自指揮的，這是他第一次指揮軍事的光榮記錄，雖不幸失敗， 國父的英勇已可概見。

自此而後， 國父更積極地策劃軍事的進行，由他直接發動同志起義的，有一九〇〇年（庚子）惠州之役（第二次起義），一九〇七年（丁未）潮州黃岡之役（第三次起義），惠州七女湖之役（第四次起義），欽廉之役（第五次起義），鎮南關之役（第六次起義），及一九〇八年（戊申）欽上思之役（第七次起義），雲南河口之役（第八次起義），就中惠州之役， 國父由日本到臺北，（按國父到臺北共有兩次，此為第一次，尚有一次在民國二年），親自策劃，一面令鄭士良在惠州起義，一面就地加聘軍官備用，依 國父的計劃，惠州的革命軍要沿著海岸向東推進，以廈門為目標， 國父則由臺渡海，親臨督戰。旋因日本政變，計劃遂遭破壞，但臺灣在中國革命史上已寫上光榮一頁。欽廉之役， 國父派王和順率領二百餘人大破清兵於王光山，當時安南的法文報紙曾論此役說：「此次革命革，不知用何戰術，能一戰而去清兵四分之一，可稱奇捷。」尤以鎮南關之役， 國父親臨督戰，以一當十，更表現了革命統帥的英勇和偉大。

鎮南關是桂省南部的一個要隘，向有「第二旅順口」之稱，這一役可以稱為小規模的要塞戰。 國父當時欲奪取鎮南關，以壯革命聲勢，乃派黃明堂於十月

二十六日率領百餘人襲取該關。當將所有鎮中鎮南鎮北三座砲台完全克復。國父在河內接得捷報，興奮異常，乃率同黃克強、胡漢民、胡毅生、及日本志士池亨吉（新聞記者）、法國退職砲兵上尉（佚名）等，於二十九日從河內搭乘火車直達同登站（距鎮南關只有數里）下車步行抵關，時已入夜，當即召集軍事會議，決定防禦計劃，並指定何伍坐守鎮南，李裕卿坐守鎮中，自己與明堂、克強等坐守鎮北，檢查所俘戰利品，為數無多，不足以增強我軍的戰鬥力。而清軍陸榮廷等卻率二千餘人浩浩蕩蕩地來圍攻。國父利用居高臨下的地形，沉著指揮守軍抵抗，又親自督率法國砲兵上尉發砲，轟擊敵陣，使敵人不敢仰攻。措因眾寡懸殊，未能由守勢轉為攻勢，給敵人以包圍殲滅。到第二天國父為遄返河內，籌款購械，以圖大舉，便偕同行者乘黑夜繞道下山。惟仍令明堂等繼續抵抗，因糧盡彈絕，及活躍於十萬大山的友軍道遠不能來援，一直抵抗到十一月四日，才突圍而出。（註六）

可是，上述各戰役，在軍事上，雖然收效甚微，在政治上，卻得到偉大的成功，震撼韃虜的心膽，樹立大漢的聲威，造成革命的時勢，促進全國各地的起義。然而國父愈挫愈勇，再接再厲，雖以清廷的嚴緝，遠避海外，乃命國內同志到處發難，於是便有一九一〇年（庚戌）廣州新軍之役（第九次起義）及轟動全國的一九一一年（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黃花崗之役（第十次起義），因而促成是年武昌起義，各省紛紛響應，國父在海外聞訊，奔馳回國，各省代表於十一月十日齊集南京，選舉國父為臨時大總統，民元正月一日宣誓就職。這時清帝溥儀，仍負隅北京，國父毅然主張用武力澈底解決，積及進行北伐軍事，每召集各軍將領指示機宜，置地圖於桌上，按圖指示，如何進軍，如何攻守，均合用兵原則，並強調革命軍不怕武器的拙劣，只要攻擊精神旺盛，便可以寡擊衆，百戰百勝。起初一般將領以為國父沒有進過軍事專門學校，不懂軍事，及至領略這一番訓示後，大家都深深地佩服他兵學的精湛，尤佩服他那種審慎而虛心的指示態度，這是一位親歷其境的老軍官告訴我的（註七）。至於決定的北伐計劃：「現在用兵方略當以鄂湘為第一軍，由京漢鐵道進。寧皖為第二軍，向河南進，與第一軍會於開封鄭州之間。淮陽為第三軍，煙台為第四軍，向山東進，會於濼州秦皇島，合關外之兵為第五軍，山陝為第六軍，向北京進。一、二、三、四軍既達第一之目的後，與第五六軍直指敵巢。」（「覆黎元洪指示北伐方略電」）這時由津浦路前進的北伐軍，所向無前，連戰皆捷，初次粵軍姚雨平及蘇軍合敗敵軍張勳於固鎮，敵方增援而來，戰於南宿州，又以姚軍及淮軍陳幹打得落花流水。於是張勳等只得放棄徐州，各路亦正謀分進合擊，直搗幽燕。清廷見勢危急，授權袁世凱議合，同時我方主和者亦居多數，遂以清帝退位為條件，而中止北伐軍事。這是民國成立以來國父首次指揮軍事的經過。

可是滿清雖告推翻，而繼滿清之後的封建遺孽及反革命勢力，卻此仆彼起，變本加厲。國父目擊心傷，認為職責所在，非重整旗鼓，繼續討逆不可。十餘年間，由討袁之役（民二及民四兩次），而護法之役（民六聲討馮國璋、段祺瑞），而討莫榮新之役（民九），而討陸榮廷之役（民十），而討陳炯明之役（民十一至十三），而討沈鴻英之役（民十二）及削平廣州商團之變（民十三）

等，就中除討袁之役，避居日本，遙為指揮各省同志起兵討伐之外，其他戰役均以廣州為根據地，就近指揮。在這個時期，國父於民六被選為海陸軍大元帥，民十被選為非常大總統，每次均攬黨政軍的大權。民十二由滬重返廣州主持討陳，因各將領之推戴，又暫就陸海軍大元帥職。可是國父原以貫徹護法、實現國家統一及完成國民革命為職志，自不能侷促於南力一隅，亟宜興師北向，剷除北洋軍閥。因此國父先後在廣州發動了兩次北伐：第一次在民十一年，國父於民十以兩廣底定，親至桂林，整理軍隊，準備於十一年春督師由桂取道湖南，大舉討伐非法總統徐世昌及直系軍閥。不料，北伐軍於是年初陸續出發到達湖南邊境時，陳炯明竟在後方勾結直系軍閥吳佩孚，既斷絕北伐餉械的接濟，且從而阻撓北伐軍的前進。國父不得已，由桂班師返粵，罷免陳炯明職務，改道江西北伐，於是年五月六日親臨韶關誓師。這次作戰計劃：第一期奪取贛州，第二期奪取南昌九江，義師所指，節節勝利，經將贛州克復，北伐軍前鋒到達吉安泰和，但又因陳炯明在後方搗亂，嗾使部下圍攻總統府，只得回師靖亂了。第二次在民十三，國父以曹琨、吳佩孚朋比為奸，毀法禍國，遂於九月率師重蒞韶關，發表宣言，檄告天下，名正言順，聲威大震。旋以曹吳倒塌，及北方國民軍領袖諸同志紛電入京共商國是，國父應召離粵北上，改用和平方式解決一切糾紛，遂中止北伐。

國父於討賊各役中，以指揮討伐陳逆之役，其沉著大膽，剛毅果斷及機智，比之中外古今的名將，毫無遜色方，洵為我國今後軍人的楷模。卻說國父因陳炯明的阻撓北伐，由桂返粵，乃免其粵軍總司令及省長兼內務總長等職，念其前勞，冀能悔過自新，仍留陸軍總長之任，旋為利於北伐起見，復畀以辦理兩廣軍務，而陳卻野心不死，竟愈演愈兇，於民十一年六月十六日嗾使部下葉舉圍攻總統府，欲置國父於死地，實現其獨霸廣東的陰謀，國父當時接得這個謀害的密報，在叛軍的刀光劍影中，從容退入楚豫艦，轉登永豐艦（後改名中山艦以為紀念），便造成「廣州蒙難」的一幕，這和「倫敦蒙難」，同樣的悲壯險絕，成為中國革命史上的兩大奇蹟。

國父登艦後，即召集各艦長商議應變戡亂的策略。這一役就海軍作戰說：假如海軍力量強大的話，就應使陸戰隊單獨登陸，佔領據點，進擊敵軍。反之海軍力量薄弱，不能單獨登陸作戰的話，就應發揮砲火協同陸上部隊，夾擊敵軍。國父當時因海軍陸戰隊，力量很小，只得採取後一策略，一面令衛戍總司令魏邦平率所部集中大沙頭，策應海軍進攻陸上叛軍，一面親率坐艦永豐及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廣玉、寶璧等艦，於十七日由黃埔出動，經車歪砲臺駛入白鵝潭，砲擊大沙頭、白雲山、沙河、觀音山等處叛軍，各彈多中標的，叛軍聞聲落膽，紛紛棄械逃遁，死於砲火之下者達數百人。惟因陸上部隊，未能如期發動策應，砲擊之後，叛軍仍散而復聚，其亂未獲平，然已足表示「正義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猶在。」（「致本黨同志書」）

國父見情況如此，遂率各艦駛回黃埔鎮守，這時各艦艦長均主張艦隊移往西江。國父卻認為只有襲取車歪砲臺，駛進白鵝潭，等候北伐軍回師夾擊，較為

得計，旋於七月十日文親率坐鑑及楚豫、豫章、廣玉、寶璧等艦，從海心岡駛往三江口，向車歪砲臺轟擊，叛軍亦發砲還擊，一時砲聲震天，雙方均有損失，各艦艦長目擊叛軍砲火佔優勢，畏縮不敢前進，國父以身作則，令座艦駛於先頭，一致攻擊前進。而叛軍在該砲臺兩岸佈置野砲有二營之多，一見艦隊駛近，便構成交叉火網，實施封鎖射擊，殲滅射擊，彈如雨下，各艦均受微傷，坐艦連中六彈，官兵死傷十餘人，國父一面指揮各艦作戰，一面觀書艙內，雍容鎮定，大有古代儒將之風。正如國父說：「此役也，以兵艦數艘，處叛軍四集環攻之中，不惟不退，且能進至省河，以懾叛軍之膽，而壯義士之氣，中外觀聽，亦為之聳。」（「致本黨同志書」）國父在白鵝潭，一直支持到八月九日，見李烈鈞、許崇智等北伐軍回師討逆的失利，認為孤守省河，於事無濟，方離粵赴滬，再圖討伐。于此，值得大書特書的，當坐艦寄碇白鵝潭時，陳逆曾運動海軍發動叛變，以威脅國父，施放水雷魚雷，以謀害國父，遣派飛機，盤旋於坐艦之上，以恐嚇國父，又用民船鋼板小輪及敢死隊，圖襲國父戰艦，這時全體官兵均驚惶失色，國父卻屹然不動，這是由於秉持「寧為玉碎，勿為瓦全」，「總統為民國而死，分所應爾」，「我輩既為國犧牲，當置死生於度外，方寸既定，逆軍其如予何？」（註八）的偉大精神所致，這種精神，正和英國海將納爾遜於伐拉加的大海戰中，身為敵彈所傷，仍負傷指揮，直至絕命為止的精神，先後輝映。

讓我於此補述國父對於海軍的研究：國父對於往昔水戰上所謂「風沙水線」的知識，無不通曉（註九），對於英美各國出版之海軍名著，無所不讀。據說：每年都訂有英國海軍年鑑，常置案上，以供參考，並屢對同志詳論海軍在國防上的重要性（註十）。像在這一役中，當肇和、海琛、海圻三大艦為陳逆運動，駛離黃埔時，叛軍以為這三大艦他移之後，則國父所停止在黃埔各小艦，均在魚珠砲臺監視之下，並為黃埔後方的海心岡，平日水深只有六尺，各艦必不能通過，那不為魚珠砲臺所轟燬，亦必為其所封鎖，任憑為所欲為。卻不知道國父對於海圖，瞭如指掌，他為應付這個突變，即派員往測該處河水的深度，一聽得水深達十五呎的報告，私心大喜，嘆為果不出所料，立即督率各艦從黃埔上游，經海心岡駛出三河口，繞道駛往新造村附近，使叛軍無所售其奸。這一個斷然的處置，使全體海軍將士，為之心折，就是叛軍方面，也深驚其神算。至於對各艦艦長主張艦隊不可移駐西江，列舉五大理由：（一）以西江水淺，各艦移至西江，僅留三大艦在黃埔，則海軍以勢分而力弱，大艦或為逆軍所買，則將來更難取勝。（二）以大本營一離黃埔，則長洲要塞必失，廣州附近水性形勢，盡入逆軍範圍之中，牽制更難，賊焰必張。（三）以總統移駐西江，其地面較廣，活動雖易，然黃埔為廣州咽喉，且有長洲要塞，其地點重要，非西江可比。且總統駐於黃埔，廣州雖失，猶易恢復，威望仍在。如移西江，地勢偏僻，無以繫中外之望。（四）海軍如往西江，重來省河較難，如北伐軍回粵，不能奏水陸夾攻之效。（五）移駐西江，而棄長洲天然之要塞，另謀陸上根據地，能否佔領，尚不可知，且西江各部陸軍，態度不明，能否為吾所用，尚未可必。如果陸上毫無根據，陸軍又不奉命，則海軍勢絀，可立而待。有此五害，故動不如靜，堅持北伐軍速來，以備水陸夾攻省城，則賊亡有日也。」又說：「各艦由此出動西江，經道

牛山、魚珠之叛軍砲臺，又有三大艦已在沙路港口，監視我各艦行動，叛軍砲臺或可鼓勇衝過，而沙路港口之三艦，監視嚴密，其妨礙我行動，阻止我通過無疑。故我艦隊此時惟有襲取車歪砲臺，駛入省城之一策，其餘皆非計也。」（註十一）這真是一個英明的指示及決策。民十三致蔣中正先生的親筆信說：「聞仲愷說：械船到時，擬在金星門內起卸，以避耳目，我以為不必如此，若為避人耳目計，則金星門大大不相宜。因金星門之對面，即伶仃關，該關有望樓，有緝艇，凡到金星門附近之船無不一目了然，實在不能避，而反露我們欲規避之心，示人以弱，恐反招英艦之干涉。因英艦已視此等海面為其範圍，此一不可也。且金星門外年年淤淺，此時之水路，當較數年前海圖，必差數尺，恐致攔淺，此二不可也。又在該處搬運，實花費太多，又恐小艇有遇風雨盜賊之危險，此三不可也。究不如直來黃埔，公然起卸為妙。」當時依照此指示而行，果得安然起卸。足見 國父的熟悉海上形勢。又說：「好像外國的舊兵艦，從前如果是裝了十二門大砲，便分成六個砲臺，要瞄準放砲，打什麼敵人，都是由許多砲手去分別執行，做指揮的人，不能直接管理。現在的新兵船，要測量敵人的遠近，在桅頂便有測量機，要瞄準放砲，在指揮官的房中，便有電機直接管理。如果遇到了敵人，不必要許多砲手去瞄準放砲，只要做指揮官的人，坐在房中，就測量機的報告，按距離的速近，撥動電機。要用那一門砲，打那一方的敵人，或者是要十二門砲，同時瞄準，同時放砲，都可以如願，都可以命中，像這種海軍砲的使用，是叫做直接管理。」（「民權主義」第六講）足見 國父對於海軍砲兵的研究。此外 國父對於古代水戰亦很注意，他說：「從前莊子說：「宋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泔澠統為事，客問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之曰：「我世世為泔澠統不過數百金，今一朝而鬻百金，請與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則與越人水戰，大破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泔澠統，則所用之異也。」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保護手在冬天不至破裂的那種藥，宋人用之不適當，世世僅供漂布後塗手之用，吳人用之適當，使供水兵冬天耐戰之用，而得一國。」（「國民要以人格救國」講詞）

前面說過 國父自討逆未果，乃離粵赴滬。可是 國父於到滬之後，依然籌劃討陳事宜，不數月（十一年底），陳逆便為滇桂各軍驅出廣州，各將領見粵局稍定。乃電迎 國父於十二年二月重返廣州主持大計，惟此時陳逆仍盤據于惠州，國父認為「孔明欲出中原，先擒孟獲，吾欲出長江，非先滅陳不可。」（註十二）遂於是年夏季，親自督師東征，其經過情形有如下述：

國父為剷除陳逆炯明以除後患，乃決計親征，設大本營於石龍。於八月廿三日乘大南洋輪船為座駕，十二時向東江進發，下午九時，抵達石龍。時天氣奇熱，船復湫隘，所處之室，僅容一席，而 國父居之泰然，按圖握管，決策定計，晝夜不少息。及至許某某由博羅來謁，請示機宜，並謂逆軍分三路來襲，李易標已抵距此二十里之湯村，敵將接近，不意帥座冒險來此也。時滇桂各軍，已與陳逆激戰數日，迄未得勝。廿五日，博羅方面，又告失敗，林某即率逆軍向石龍進犯。廿六日，博羅飛鵬嶺失守，逆軍佔銅鼓嶺等地。 國父乃命飛機出發博羅，使守城者知有援應，並親函許某某堅守，

更命差艦載糧冒彈前進，以資接濟，又電廣州促援軍急速來援，羽檄如雪片，而軍行轉緩，蓋廣州滇軍待餉乃發，不問博羅被圍之急與不急也。因之博羅之圍，終不得解。廿七日，情勢亦惡，及至深夜，尚不見援軍之至，國父乃遣古應芬回省，催促滇軍福軍與吳鐵城所部開進。李福琳即率所部偕朱培德赴前方，同時吳鐵城部亦開抵增城。廿九日，國父由石龍向博羅前進，從禮村至蘇村，沿途風雨急驟，船阻難行，甚至李福林、吳鐵城兩部負偵察任務之騎兵，均不得進，座駕小舟，顛簸動盪，勢頗危險，然國父正襟危坐，策畫軍事，並以民元以前之革命史，昭示同行官佐，而披閱圖籍，未嘗一日輟也。卅一日，國父由鐵岡泊池地抵松村，博羅時被圍已久，守將劉震寰拚死堅持，城下水漲急，軍不得近，僅以砲遠射而已。適譚延闓入湘之軍，由敗轉勝，捷報傳來，國父喜形於色，乃命各軍攻擊前進。九月一日，座船至第七碇，命福軍滇軍登山警戒，並飭副官於山顛燃火為號，使城內知主帥親自來援。次日，國父親登北嶺，事事躬躬為之，於致胡漢民書曾云：「吾今日兼盡一排長之職務，凡偵查敵情，考察地勢，吾悉為之。」惟其時滇軍大部份尚未集中，且驕不受命，國父不得已，重返石龍督促，雖許滇軍祿國藩以重賞，而無效果，憚將驕兵，殊可恨也。三日，東路軍所屬師長張民達，與逆軍戰於淡水，大破之。四日，張至石龍捷報請訓，國父命福軍滇軍分左右兩翼進攻，滇軍第四次要挾軍餉未得，全軍引退，止之無效。得南路鄧本殷攻陷北海訊，國父命永豐艦往援。七日，許某某決突圍，但以援軍不克，早八時，福軍與逆軍大部接觸，滇軍田中毅，粵軍張某某等部開雄雞拍翼佈陣。國父親自登山督戰，左翼福軍，初猶小勝，及逆軍大部衝進，福軍退去，逆乃乘勢闖進，沿義和墟而蘇村，欲斷福滇軍之歸路。是夜，退至石龍。八日，重進蘇村，張部等會同福軍，進攻義和墟之逆，破之。九日，國父由雄雞拍翼至譚公廟，率屬登山督戰，各軍奮勇分途追擊，鏖戰甚烈，自朝至午，進退數次，雙方均有死傷。十日，博羅守軍楊廷培，突圍至銅鼓嶺，逆軍死傷枕籍，向派尾嚮水退卻，博羅之圍，乃得以解。國父即乘艦赴梅湖視察重砲兵陣地，以備進攻惠州。博羅之圍解後，國父命福軍及張部等分途追擊，十一日，克平山。十二日，命飛機隊往惠州城投彈。十三日，國父入梅湖，親發重砲（由虎門運往之十五生的要塞砲）五彈，轟擊陳逆所盤據之惠州城。次日返廣州，得增城報捷訊。十八日，國父復至前方。二十日，至飛鵝嶺籌攻惠州，上午十一時至砲兵陣地，被逆軍發見，敵即不斷發砲向國父射擊，彈落身旁，距不尋丈，從者多為國父危，而國父但諭以無恐，並謂敵砲射程已止於此，縱密發，必不及。此種大無畏精神，與料敵之準確，軍事專家嘆為罕見。旋以事返梅湖，留程清等禦敵，行至中途，忽聞爆炸聲甚烈，後知白沙堆所泊電船自炸，飛機隊長楊仙逸，長洲要塞司令蘇從山，魚雷局長謝鐵良均遇難。廿一日，復至梅湖重砲陣地親發六彈攻惠城。次日復攻，雖不破敵，逆膽已寒。廿三日午，合各軍並進，作衝鋒之搏擊，戰至二十四日拂曉，以魚雷炸城基，飛機擲炸彈，亦不克。午後，逆軍反攻死亡適鉅，不支而退。十月卅一日，兩軍相戰，互有勝負，劉震寰於是日退出飛鵝嶺，十一月六日，國父恐博羅失守，重行出發親征，激戰之餘，雖告勝利，而惠城仍然在逆軍之

手。八日，逆軍傾巢而出，各軍均受挫。九日 國父急懸重賞，嚴督反攻，無如各軍各顧地盤，不肯力戰。十一日移大本營於石灘車站。十二日，逆軍迫近石灘，被滇軍擊退，旋聞蒙蘭，鐵牆方面戰急，討逆軍不支， 國父即令新到之李根澧部沿廣九路前進，不移時，聞戰大敗，潰兵沿鐵路紛奔，訛言四起。 國父帥率古應芬，李烈鈞等急下車制止，以圖反攻。不料潰兵多不從命，向後紛退，車遂倒行，侍從秘書副官黃惠龍等乃強 國父上車，旋改登機車，直開廣州，而李烈均等已不及趕上，特另乘車到石灘佈防。時逆軍乘勢尾隨，幾及石灘。然而范石生一聞敗耗，不待炊畢，急奔赴援，大破之於石灘以東，逐逆軍洪兆麟部於石龍。逆軍之勢乃稍戢，事後各路逆軍復以重兵自廣九路圍迫廣州，廣州形勢危急，不堪言狀， 國父仍本其大無畏之精神，堅持一兵一槍之奮鬥，又急電湘軍豫軍馳援，豫軍樊鐘秀部日夜兼程趕到廣州，徒步出擊破之，廣州賴以保全。是役也， 國父之危，不減於白鵝潭之役，而堅剛勇邁之氣，視白鵝潭之役殆尤過之，從其役者，談及此番戰事，莫不神往。（註十三）

以上記載，自然不夠詳盡。雖說戰鬪以殲滅敵人戰鬪力，迅速獲取勝利為旨， 國父在這一役中，以八十餘天的短期間，因陳逆憑據惠州的天險，及我方雜牌軍隊未能用命，致不克將其包圍殲滅，卻給予重大的消耗，並摧毀其鬪志，尤以 國父親臨前線督戰的精神，足以感召我全體革命將士，造成他日東江大捷的因素。就通例說， 國父以大元帥的地位，五十有九的高齡，對於討賊軍事，本應坐鎮後方的廣州，遙用電話電報來指揮，卻不顧一切險阻，毅然挺身到前線去，如設大本營於石龍，親到砲兵陣地發砲轟擊陳逆，及敵砲對其射擊，彈落身傍，而不退避等，這種大無畏的精神，實與拿破崙在法奧之役，舉旗前進的精神，同出一轍。

此外，在此役中尚有兩點，值得一述如下：

一、是披閱圖籍：我們知道，不能判讀地圖，固然不配做指揮官，而地圖又常為指揮官必攜的工具，指揮官不能拋棄地圖而指揮作戰，正如航海者不能拋棄羅盤針而航行。否則，在戰場上就變成瞎子，既不辨東西南北，也不辨地形地勢，固不會適切地運用戰略戰術，更無從判斷敵軍的企圖，位置與配備。 國父對於輿圖向極重視，民前十三年冬在日本曾自製中國地圖，並在自跋中強調說：「蕭何入關，先收圖籍，所以能運籌帷幄之中，而決勝千里之外，卒佐漢高以成帝業者，多在此云。」據說：在這次東征中，常吩咐參謀秘書或親自攜帶地圖，到野外時，平鋪地上，站著用爭杖指點判讀，並指示部屬。在軍營中，懸掛壁上，或平置桌上，用紅藍鉛筆劃出記號，以為指揮作戰的根據。登山視察地形時，用望遠鏡瞭望之後，又對照地圖，判別有否差誤，對圖上所示路程的遠近，山川的高低廣狹，都能迅速計算出來。對於地圖上一個很小地名，都能記得清清楚楚（註十四）。雖在督戰時，一有餘暇，便手不釋卷，一種好學的精神，真為常人望塵莫及。考拿翁在作戰時，他不論自己擔任職務怎樣重大，凡關於豫定戰地，必先在歷史上和地圖上仔細研究，並自行嚴密整理各種地圖，出發時，在龍

駒的革囊中常攜帶必要的地圖和書籍，以精嫻拿翁韜略的 國父，也許受其影響。

二、是使用空軍助戰：空軍的大量使用於戰場上開始於第一次歐洲大戰，從此戰爭的形態，便由平面變為立體，空軍在現代戰爭上幾取陸海軍的地位而代之，沒有擁著強大的空軍，而被迫參加現代新型的戰爭，其吃虧將不堪設想。國父對空軍的認識，在中國實為第一人，民元在南京就臨時大總統任內，已設立航空隊，並購「飛船」。（「覆黎元洪告已購飛船及各物電」）民六致南洋同志書說：「飛機為近世軍用之最大利器」，並鼓勵同志學習飛行，派遣同志到外國學習航空，提倡「航空救國」，及在廣州大沙頭設置航空局，有飛機六架，水上飛機一架，他說過：「像飛機不是一次做成了便可以飛的，是經過許多次的改良，才完全成功。……像大沙頭的那般青年飛機師，從前不知道怎麼樣飛，只是請外國的技師來教，所以學到現在，便飛得很好。」（「國民奮鬥之法宜兼注重宣傳不宜專注重軍事」講詞） 國父在這次東征中，為導致戰局於有利的形勢，曾派空軍到前方助戰（註十五），雖說當時擁有的軍用機連練習機僅有十餘架，未能實行「杜黑主義」，使用強大的空軍，協同地面部隊，一舉而殲滅逆軍，且機上所裝置的機關槍，係步兵使用的手機關槍，所投擲的炸彈，係改裝的水雷或迫擊砲彈，一切都是很幼稚的（註十六），但卻可以看到 國父已拋棄陳舊的平面戰爭的觀念，踏上嶄新的立體戰爭的大道了。于此應附帶一說的： 國父亦已從事於現代裝甲部隊的建設了，裝甲部隊以戰車為主體，它具有優越的運動力、攻擊力與防禦力。而這號稱為「地上雄獅」的戰車，係出現於第一次歐戰，並在戰場上表演了驚人的奇蹟。自此以後，各國競相建立裝甲部隊，加以英國裝甲部隊理論家富勒將軍的鼓吹，更使裝甲部隊的建設與空軍的擴張，俱成為今日世界軍事的兩大主流。 國父對於第一次歐戰很有研究，對於歐美鼓吹建設裝甲部隊的理論，自必受其洗禮，所以在當時物質條件的限制之下，仍勉力設置一個「甲車隊」，設計者為擅長甲車戰術的俄國顧問李廩君（註十七），雖說這個甲車隊亦同飛機隊一樣的幼稚，使用於鐵路上的改裝鋼甲火車（據說使用於廣九、廣三、粵漢鐵路上收效頗大），使用於公路馬路上的改裝鐵甲汽車，均為數無幾，及擁有的坦克兩輛尚在試驗中（註十八），但此舉卻開了中國裝甲部隊建設的先河。我們今後的建軍，應澈底地接受 國父這兩個偉大的遺規吧！

還有： 國父於同盟會時代的一九〇五年，親訂軍事規章：「軍政府與各處民軍關係條例」，「軍隊之編制」、「將官之等級」、「軍餉」、「戰士賞恤」、「軍律」、「招軍章程」、「略地規則」和「因糧規則」等。於中華革命黨時代的一九一四年，又親訂有：「中華革命黨革命方略」，內分「軍政府」、「限制勳紀」，「軍律軍法」，「因糧徵發及其他則例」等，其中大部份亦屬於軍事規章，從這些規章看來，非對於兵學及軍事法規素有研究，曷克臻此。其次是 國父鑒於歷次革命的失敗及蘇俄建軍的成績，以為今後欲掃除國內反革命勢力，尤其為鞏固中國國防及對外打倒帝國主義，決不是利用烏合之眾的民軍，可以成事，因為他們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缺乏戰鬥的能力，也不是利用舊軍閥的武力，所可濟事，因為舊軍閥以爭權奪利為目的，不聽命令，不守紀律，隨時可

以幹起反革命的勾當來，像陳炯明、陸榮廷、沈鴻英之流，何莫非一度投機參加革命，但終變成與革命為敵的反動軍閥。所以非從新建設強大的革命武力不可，尤非從新養成大批新革命幹部不可，這便是 國父設立黃埔軍官學校。（原名「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原因。 國父為設立這個軍官學校，於民十三年派蔣中正、廖仲愷兩先生負責籌備，旋任蔣氏為校長，廖氏為黨代表。開學之日，國父親臨致訓，勗勉全體學生以「革命軍的基礎在高深的學問」。從此積極訓練，一面授以軍事學術，一面施以政治訓練，因而養成無數革命的幹部，在現代中國建軍史上寫上最光榮的一頁。

西人論將帥的條件：「一曰無畏的大勇，二曰創造的智慧，三曰強健的體魄。」德國名將魯登道夫也說過：「主帥的地位，應為第一等艱辛，第一等天才，第一等堅強意志。」國父實足以當之而無愧。 國父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文武合一的大人物，也是現代一個智仁勇兼全之天才的大軍事家！

- （註一）波亞（Boers）人為荷蘭農民移殖南非，分居杜蘭斯亞及阿倫治自由邦， 國父在「錢幣革命通電」中所稱「杜阿二國」，即指此。在「軍人精神教育」中所稱「杜國」即指杜蘭斯亞。在「民權主義」裡所稱：「波人」，即波亞人。
- （註二）堪瑪利將軍 Homerlea（976—1012）美國軍事專家，著有「無知的勇氣」一書，風行各國。與國父結識於三藩市，共同研究軍事，旋與國父經歐來華，曾任南京臨時大總統府高等軍事顧問，國父譽為「天下最傑出軍事家」。
- （註三）據馮自由先生於民國三十年七月由渝給我的信。
- （註四）、（註五）、（註十四）及（註十六）據李仙根先生口述。
- （註六）據胡毅生先生（是役參加者）口述，修正坊木記述寫成。
- （註七）據張先生口述。
- （註八）及（註十一）見蔣中正先生著：「孫大總統廣州蒙難記」，國父語。
- （註十）據張溥泉先生口述。
- （註十一）見鄒海濱先生編著：「中國國民黨史稿」，國父語。
- （註十三）參照胡去非編纂：「總理事略」第十一草六十節寫成，並承參與是役兩位老同志校正。因該文據古應芬著：「孫大元帥東征日記」寫成，而古著與事實略有出入。
- （註十五）據國父促工棠速辦攻惠軍需書說：「新飛機日內可到，必照應著航空局趕將飛機配好，趕來前敵應用。」
- （註十七）國父致蔣中正先生函云：「前李縻將軍要取手機槍拾八枝，為配甲車之用，務要照發。……李君專長甲車戰術，一切須由其配備乃能靈捷，且敵人已來窺翁源、河頭，欲斷我省韶鐵路之交通，我日內往韶關，則此鐵路之防備更為急要。」
- （註十八）據趙超先生口述。

參攷書：

胡漢民先生編：「總理全集」，黨史史料編纂委員會編：「總理全書」，吳秩暉先生著：「總理行誼」，張其均先生著：「黨史概要」，馮自由先生著：「革命逸史」，陸輯：「孫中山先生外集」，中宣部編：「國父孫中山先生年譜」等書，及克勞塞維慈「戰爭論」，魯登道夫「全體性戰爭」，拙作「孫子兵法新研究」等書，又，本書全文所參考書籍達一百二十種，論文二百十五篇，為節約篇幅，未能盡錄，合併聲明。